

序 言

周保中同志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杰出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和优秀党员。在艰难的战争年代，他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周保中同志的高大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周保中同志原名奚李源，字绍黄，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人，白族，生于一九〇二年。他十五岁时，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虚报两岁，投军入伍，参加了“讨袁护法”的斗争。以后，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工兵科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大革命的激流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的组织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周保中同志曾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秘密到浙江、湖南、河南、河北及山东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一九二九年冬，中共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党派他回上海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派他到满洲省委工作。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到了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事运动部主席（即军委书记），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

“义勇军组织法”等。约半年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派他到抗日自卫军和救国军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党的威信。

一九三五年二月，周保中同志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军党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底，他又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领导四军、五军、七军、八军、十军和救世军，此外一路军的第三师也经常和五军部队在一起战斗。部队活动在吉林省东部地区和中东铁路、哈绥铁路两侧及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等广大地区约三十余县，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他和东北人民一起与日寇奋战了十四个年头。

日寇投降后，周保中同志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十几万八路军和数万党政干部，迅速进入指定地区，及时掌握了东北地区的领导权。同时，他积极协助彭真、陈云、李富春、林枫等同志，为消灭日伪残余势力，实行土地改革，扩建党和军队组织，建立东北各级地方民主政府建立了功勋。

周保中同志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期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领导了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同日寇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并牵制了日寇精锐的关东军六、七十万人，伪满军三、四十万人；积极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周保中同志从入党的那一天起，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他都是战斗在第一线，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不懈的

斗争。他曾五次负伤，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仅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他就曾三次负伤，有一次肠子被打出来了。当时，哪有医疗条件呀！连治外伤的药也没有，可是他不叫一声痛，硬是将肠子塞回腹部，敷上草药，用绑腿缠好，仍然坚持战斗和工作。他的模范行动，深深地鼓舞着广大的抗联将士。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进入了高潮。抗日烽火到处燃烧，日本侵略者到处挨打、碰壁，伪满军成连成团的起义；参加抗日救国的人们也揭竿而起，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然而，日本侵略者为了加速实现占领全中国的狂妄计划，调关东军入关。这就必须先拔掉插在他心脏上的一把钢刀——东北抗日联军。为此，将关东军增加到五十多万，再加上伪军、山林警察大队等，聚集了多于抗联几十倍的兵力，对抗联进行了疯狂、残酷的“讨伐”和围攻，使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极其残酷的年代。

一九三八年冬，整个形势对我抗日联军来说更加恶化，日寇加强了对抗联的围剿，对群众已完成一整套的法西斯统治：强迫归屯并户，修集团部落（围子），搞保甲制，实行十家连坐，一家犯法，十家全杀。同时，用深沟堡垒，坚壁清野，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等办法，企图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在军事上则继续增加关东军到六、七十万人，进行“大讨伐”，步步推进，实行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来回拉网、搜捕、围攻，派特务混进来搞瓦解、破坏、暗杀等来进攻抗日联军；天上配以数十架飞机轮番侦察、扫射、轰炸；以步兵和骑兵交替搜索追击，企图一网打

尽，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当时的情况，对我军是十分不利的，自然条件也威胁着我们，气温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北风怒吼，大雪齐腰，冻得断指裂肤，肚子里又缺少食物。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周保中同志却鼓励同志们说：“越是困难的时候，同志们越是要振作革命精神，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决不能苟且偷生，玷污伟大革命战士的气节。”为了突出重围，一天，他命令部队保持一定距离，跟着敌人的踪迹行动，然后，在深夜穿插，绕过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行程二百多里，终于钻出了牡丹江东岸的敌人包围圈，紧接着又以神速的行动，袭击了方正县陈家亮子的日寇“森林采伐队”，达到了歼灭敌人，补充枪支、弹药、服装、给养的目的，并解放了一千多名林业工人。在周保中同志指挥下的其他部队，在互相支援密切配合下，也同样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大讨伐”计划。

正是由于周保中同志忠于我党的民族解放事业，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因而日寇对他深恶痛绝的。早在一九三六年，日寇就先后在牡丹江地区、松花江下游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或散发传单捉拿他，并以重金收买他的首级，赏金由五万元增加到数十万元。然而日寇却什么也没捞到，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东北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可是当年出卖东北的蒋介石，妄图吞并抗战的胜利果实，又拉开了内战的战幕。周保中同志这时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

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共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委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局的领导下，仍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到了北京正准备南下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了，住进了北京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认为，必须进行治疗和休息，最少要半年时间。但是，周保中同志却坚决要求带病南下，对劝他的医生和同志说：“多少同志都倒下去了，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多年来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我决不能掉队。”他决然南下了。云南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共西南局委员等职。因周保中同志是白族，对多民族的云南省的党政军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带病坚持工作三年多，到一九五二年冬，心脏病更加严重了，多次休克，医生再三劝告他治疗休息一年，组织上也要他听医生的话，这时他才同意休息治疗。不久，调他到西南大区工作，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等职务。他到重庆后，早已把疾病忘在脑后，忘我地工作着。直到一九五四年夏，他的病很严重了，心力衰竭，就连拿一杯水的力量都没有了，情况很是危险。经贺龙同志报告中央，周总理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治疗中，又发现他患有严重的胆结石症，每次发作都严重地威胁着心脏，随时有生命危险。此时此刻，周保中同志丝毫未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在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中，还忙着看文件，整理历史资料，接见来访同志，或者去参加会议等。我和同志们多次

劝他要注意休息，可他却说：“我为党工作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只要我能动，就要为党做些工作，不看党的文件怎么能行呢？”

一九五九年周保中同志的病情更加恶化，严重的心肌梗塞，卧床不起，不准探视。这时，东北来了两位同志要和他谈问题。我和我的秘书考虑到他的病还在危险期，不能会客，就拖延了几天才告诉他。他立刻批评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远道来的同志应及时接见才对，我不能起床就躺着谈也好嘛！过去打仗时和群众在一起，今天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不能和群众疏远。”他对群众来信、来访，都是有问必答，有求必见。有些事情年深日久很难想起来，他就写信向老战友询问后再回答。有些信，是他直接答复的，有些虽是请秘书代写的，但都是在他亲自过目或修改后才发出的。

周保中同志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他继续发扬大革命时期、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股革命干劲和革命热情，克服了病痛的折磨，用颤抖的手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我和同志们都劝他等病稍好一些再写，可他执意不肯搁笔。按他的说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现在活着的人不多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自己有限的时间整理出来，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牺牲了的先烈们。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周保中同志夜以继日地写呀，写……

周保中同志因病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他

的高大形象，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周保中同志的遗作《战斗在白山黑水》一书出版了。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仅是周保中同志生前在病榻上所撰写的一小部分。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十四年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先烈们的光辉业绩；是了解和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以及激励人们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的有益教材。

我作为周保中同志的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对于周保中同志遗作的出版，感到十分欣慰。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让我为此书写序，我感到很荣幸。但苦于自己水平有限，又对整个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史和周保中同志的整个经历了解不够，恐有失读者期望，深表歉意。

王一知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